

迎着枪林弹雨拍照片

我1950年11月入朝,那年才21岁,不过已是当了8年兵的老兵了。

我13岁加入新四军,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1948年,部队交给我一个任务——学摄影。一开始,我心里想不通:“为什么不让我端枪打仗?”科长说:“现在大多数摄影师没有战斗经历,你有连队生活经验,又在战场锻炼过,将来在前线会更机敏些,所以我们要让你学摄影。”科长的解释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新职责:战场上,端相机就像端枪一样。

当时,照相行业多是照相馆里师傅带徒弟。我在战场上,没师傅带,只能靠自己摸索。参加部队组织的新闻培训班学习基础理论后,我想办法跟着



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,张崇岫随部队强渡昭阳江。敌人向江面疯狂射击,炮弹在他身边爆炸,他拍下了整个过程

部队老摄影师、来中国拍纪录片的苏联摄影队等学习,逐渐学会使用照相机,并总结出自己的拍摄“道道”:在战场搞摄影,胆子要大,哪里枪响就往哪里跑,只有冲在最前线,才能拍出最真实、触动心灵的作品。

作为志愿军第九兵团摄影组组长,我把几十卷胶卷放进布袋里,像子弹

带一样别在腰间,带着一台徕卡相机、一台蔡司相机,随军在朝鲜东线作战,几乎全程参与了抗美援朝第二次及第五次战役。1951年的一次战斗中,我跟着志愿军战士追击南逃的美军,拍下美军士兵向志愿军投降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取名为《不得不举起手来》,被志愿军政治部评为二等甲级奖。当时子弹、炮弹还在头上飞,但我不下去拍,就抓不到这个场景了。

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遇险是常有的事。我曾在拍照时被美军的重机枪追

着扫射,被敌机撵着轰炸,头顶被炮弹刮过,秃噜了一块头皮,腿被炮弹炸伤,听力也受到损伤。长津湖战役期间,我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,用冻得半僵的手指设置相机参数,和战士们一起冲锋,用了3卷胶卷,记录下这场举世闻名,却又悲壮惨烈的战役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:负责战场警戒的志愿军战士换岗时,手碰到枪管,4根手指头直接掉落在雪地上,红红的伤口却流不出血。

长津湖战役后,我与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一同去死鹰岭查看部队伤亡情况,被帆布覆盖着的烈士遗体整齐排列着。我应该拍的,可面对这场景,我不忍拍。(口述/安徽合肥 张崇岫 整理/潘娣)

自制板胡陪半生

我1962年任民办教师的时候,教音乐课,凭着上初中时学的乐理知识,教学生歌曲就可以了。可是,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开展文艺活动,搞文艺演出,就必须有乐队。没有乐器,我得自己造。

我找到一根旧琴杆,让木工做了两个旋轴;找来一个椰子,加工成瓢(琴筒);找来一块薄梧桐板,粘在瓢上;弓子,用细竹竿弯成;马尾找不到,把塑料绳破开,开水一烫,拉直;琴弦,用电线中的钢丝代替。最复杂的是调音,梧桐板必须用纱布打磨,装配好试音,音质不好,拆开再打磨,反复进行……就是把改制的板胡,伴随我大半生。(山东济宁 姜存友 77岁)

好老师萨乌洛娃



萨乌洛娃老师(右)

1957年秋季开学,来自苏联的萨乌洛娃担任我们精读课老师。她知识渊博、语言简练,讲课思路清晰、重点突出、生动幽默,结合课文能讲出许多典故、趣闻,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,提高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。她向我们传授知识的同时,还注重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办法。她不仅关心我们学业的进步,讲课时还穿插一些运动健身、品德修养、艺术欣赏之类的内容,启发我们追求人生的美丽、生命的光彩。

萨乌洛娃是我最爱戴的一位老师。可惜的是,1958年秋季开学,她没有继续在我系任教。后来我才得知,她已回苏联了。老师,我很怀念你。(安徽芜湖 伍国荣 90岁)

毛遂自荐进山当老师

1975年6月,我得知深山里一个村子缺老师,就毛遂自荐。原来的代课教师是一个上海女知青,回城去了。我当货郎送货下乡时,多次去过那个山村。那里偏僻,路远,离我家有七八里路,但听说那里需要老师,我自告奋勇前去联系,队长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因为自从原来的老师走了后,学生已经一个多月都没上课了。

我只是初中毕业,没想到这么顺利,很是高兴。第二天,我就打起铺盖去上任了。学校设在一

个大祠堂里,教室就是一间小屋,学生有十五六个,复式班,一二三年级的语文、算术、音乐、体育全是我教。每到星期六,我回家和母亲团聚一次,还要带点米、油和菜来——我得自己做饭吃。我那时没教学经验,基本上照本宣科。但不管怎么说,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,就想尽量好好教。村民们对我很热情,也很尊敬。有的村民常常送我些自己种的青菜,或是自家做的豆腐。有的村民家来了客人,会叫我一块去吃饭。这些关

怀,使我心里感到暖暖的。孩子们也很喜欢我,帮我掰竹笋,还带我到山上砍柴烧木炭。

当了几年代课老师,恢复高考后,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。师范毕业,我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老师。回想起来,是当初的毛遂自荐改变了我的人生路。(江西峡江 梁长红 67岁)



年轻时的梁长红

年轻纺织女工全是“老手”

1972年,我23岁,是湖南省桃源纺织印染厂的一名纺织女工,从事细纱挡车工作。

那时,我每天穿梭于纺纱车“弄堂”,照看800至1200个纱锭,不能让纱锭断线。倘若断线了,没有纺成细纱的棉花就会不断地“喷开”,俗称“开花”。一个“开花”的纱锭如不及时拔出来重新接上,会导致周围的纱锭成片“开花”——这样无法掌控的场面,在初为纺织女工时常常发生,以至使人心急

如焚,甚至泪奔。而要拔出那高速运转的纱锭,就会把手磨出一个个硬茧。因此,车间里20多岁的姑娘们全都是一双沧桑的“老手”。

早中班9个小时(含半小时用餐),晚班6个小时,我们在纺纱车“弄堂”里不停行走,有时甚至是小跑。粗略估计,一个班约要走20至30里路程。全封闭的车间里,听到的只有机器轰鸣声,闻到的是裹着机油和棉灰的气味。腰酸腿疼,精疲力尽,是纺织女

工的常态。有段时间我得了肝炎,茶饭不思,全身无力。当时的口号是“为了超英赶美,要一不怕苦,二不怕累”,大家生了小病是不会下火线的。一开始,我没去看病,也没有休息,坚持工作。直到确诊为肝炎后,才休息了半个月。

在车间工作三年多后,我被抽调到子弟学校任教。50多年过去了,回想起当纺织女工时那种倾情奉献的经历,我仍无怨无悔。(湖南长沙 胡孟媛 75岁)

跟着姐姐学缝纫

自1984年父亲病后,家境困顿,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姐姐辍学了,赶集摆地摊。这个时候,她发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生计——裁剪缝纫。

当时,姐姐去学会了裁剪,然后用摆摊攒的100多元钱买回了一台“飞人”牌缝纫机。自此,姐姐开始了缝纫生涯。这台缝纫机,是我们家添置的最贵的一件家当,一家人高兴极了。之后,全家人的衣服,甚至亲戚朋友的衣服,大部分都是姐姐用缝纫机做出来的。姐姐逢集赶集为别人裁剪缝纫,赚取生活费,更是为我们家立下汗马功劳。

1993年,我高中毕业,在一家企业上班,晚上下班回来,开始跟着姐姐学做衣服。在我结婚的时候,母亲给我陪嫁了一台“飞人”牌缝纫机。(河南孟津 尤永卫)

征稿

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,这些人生节点中,有哪些难忘的故事?“当年”版“整十人生”专题欢迎您投稿讲述。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